



# 两宋物质文化引论

在物质文化领域，宋代文化形象的矛盾性突出地体现于创新与复古兼济并行的双重性。创新与复古结伴而行、兼济一身的特性赋予了我国历史上这个文化的“古典”时期以双重的内涵——与复古相系，它作为三代以迄汉唐之历史传统的复兴者，成为后代追寻“古典”文化范式的近晚来源；与创造性相系，它所创立的制度、法式为物质文化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某种“新”古典的范式来源。于今而论，复古与创新、“古典”或“新”古典，这些语词正好触及到了当代器物设计所奋力追求却往往难以企及的设计理想的某些主要方面。这一点使得宋代物质文化格外焕发出一种迷人魅力，引导着研究者将探究的目光投向其历史经验的方方面面。

徐飚著

博士，女，1968年2月生，浙江省金华市人。

1998年以前，先后就学于浙江大学机械系、南京大学哲学系、东南大学艺术学系，取得工学学士、哲学硕士、艺术学博士学位。

1998年以后，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主要从事设计史论的教学与研究，并先后获省留学基金和校学术交流基金资助在英国杜伦大学东亚系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访问学习。

1991年荣获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1年荣获全国优秀百篇博士学位论文奖。

本书的研究受到国家教育部优博专项基金资助，历时五年完成。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宋物质文化引论 / 徐飚著.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344-2230-0

I . 两 ... II . 徐 ... III . 物质文化—研究—中国—  
两宋时代 IV . K87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8005 号

**出品人** 顾华明

**责任编辑** 顾华明

李黎

**特邀编辑** 郭廉夫

**书籍设计** 朱成梁

**审读** 李立新

**责任校对** 刁海裕

**责任监印** 高波来

**书名** 两宋物质文化引论

**著者** 徐飚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南京爱德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718 × 1000 1/16

**印张** 21.25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2230-0

**定价** 48.00 元

营销部电话 025-83245159 83248515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13 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徐 験

博士，女，1968年2月生，浙江省金华市人。

1998年以前，先后就学于浙江大学机械系、南京大学哲学系、东南大学艺术学系，取得工学学士、哲学硕士、艺术学博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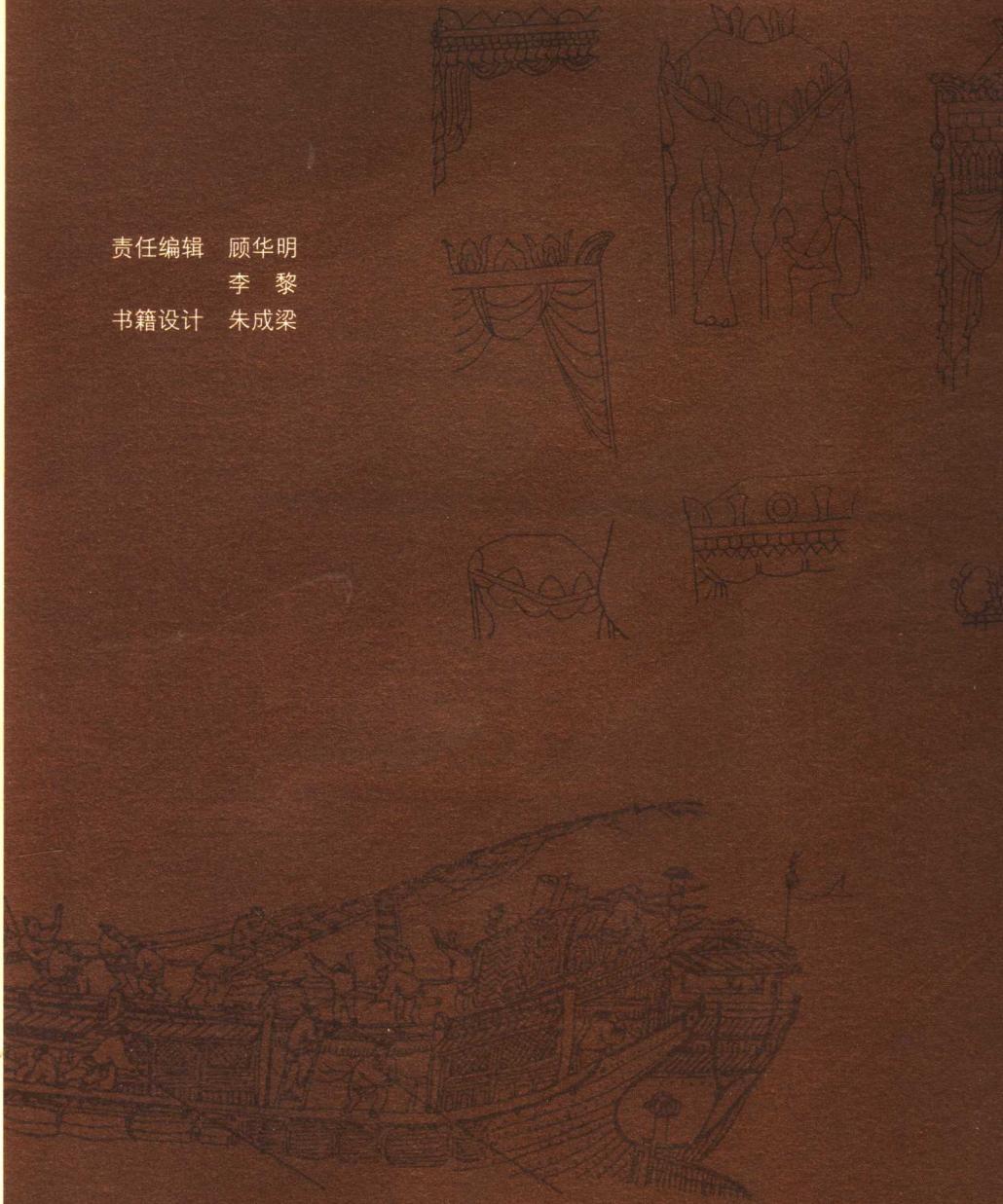
1998年以后，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主要从事设计史论的教学与研究，并先后获省留学基金和校学术交流基金资助在英国杜伦大学东亚系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访问学习。

1991年荣获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1年荣获全国优秀百篇博士学位论文奖。

本书的研究受到国家教育部优博专项基金资助，历时五年完成。

日至吳子壽終十九世當晉成  
來楚一歲十奔命遂夷屬於  
於上國是上閭廬西破楚入  
諸侯繁大小城都之今州城  
越分境後吳伐越越子敗之  
當城是也其子夫差為越王  
云玉至無禮為楚威子所滅  
列王共相春申君黃歇為大  
楚使其子為假君留吳支  
楚史書魯大子事

责任编辑 顾华明  
李黎  
书籍设计 朱成梁



## 自序

关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指归，梁启超有过一段简明的表述，云：“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延续活动之本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参见《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载于《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107页）简单说就是以史为鉴。这同我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所设定的基本价值目标大体是一致的。

然而，自近代以降，在西洋长技及其先进制度和思想学术的冲击下，我国历史传统的“资鉴”作用却普遍成了疑问。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于技术器具，继之以社会政治制度，进而渗透于吾华文化之根本，本国历史传统遭受普遍怀疑和背离的进程历历在目——一方面，本国历史传统各个面向的资鉴价值渐次经历着虚无化，与此相应，西洋文明则以其事功层面的显著效率挟裹着本质上的侵略性力量一路凯歌突进将我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历程拖入了一个看似无可逃脱的西方化过程。（案：“侵略性力量”的提法参见美国汉学家艾恺的观点，他指出：“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其他



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采用现代化之道。现代化乃是一种理智化和效率化的过程，其效果则见于能有效地动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力物力，并且在国家体制的有效管理下和民族国家的理念之催化下，强化这一国家和地区。换言之，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性能力，而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作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即尽快地实现现代化。”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第3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迄止如今，本国历史及传统文化之研究价值的合法性依据依然是漂浮的，包括物质文化史或成器活动历史在内，多个历史领域的研究价值的具体可落实之处也依然是令人茫然的。

另一方面，回顾我国近代以来寻求文化发展方向的历程，在西方化主潮之下也同时涌动着一股堪称强大的潜流，那就是以学衡派以及梁启超（晚期）、梁漱溟、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守成论者所怀抱的对于传统文化之价值的坚定信念。（案：如艾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批判现代化过程及其结局是对人类诸般价值的残害，他们提出融合中西文化，指出未来的世界文化——或最起码将来的中国文化会是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体”，参上引书，第5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本国历史价值的救渡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批判现代文明之缺陷与弊端、问题与危机的途径，并且，他们的批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援引了来自西方现代化世界内部的批判资源。尽管在学理上显出乏力之态，他们力图维护传统文化价值的信念和立场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却始终有着深切的认同和回应，也发生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今而论依然显示出其重要性：以文化守成论为



代表的为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辩护的基本言路依然伴随着现代性层出不穷的问题与危机的显露而延续着——在时间上最为晚近的一个表现形态似乎就是那伴随西方世界“后”学氛围中出现的各种思潮和动态而在多个学术领域一度兴起的国学热。

不论“后”学本身显露出多少可供批判的弱点，“后”学时代所达成的思想成果当中至少有一项是堪称富于裨益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处在西化进程中的国家和民族而言还多少带着几分鼓舞人心的色彩——那就是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破除以及多元化文化景观的呈现。以西方文化为内核的单一形态的现代文明并不能够带领人类踏上通往天堂之路——在眼下这个“后”学时代，《圣经》关于通天塔的启示仿佛再一次向西方世界重申着人类的宿命。与此相关，在包括中国在内被拖入西化过程的国家里随即掀起了对各自民族传统文化的热忱。就我国的情况而论，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实际上那也正是近代以来知识阶层在文化认同上的危机心理在新的历史境遇激荡之下所呈现的一种回应方式，因而其中大有可能包含着某种或许于事无补的情绪化因素（案：正如刘小枫觉察到的，“民族性比较中积聚的种种情结，一再推延了‘中国问题’向现代性问题的转化”，《现代性社会理论》，第197页）——它有时候表现为寻求文化自尊和自立的倾向，在较极端的情形下则可能膨胀为各种形式的中华文化中心论。

在物质文化领域或成器活动领域我们也容易找到与此类似的动向。西方设计界始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已蔚然可



观的各种“后”学思潮与探索，同样指向了反对现代“经典”、破除现代“传统”一元论的方向，进而揭开了多元化发展的新局面。与此相应，西方世界之外如本国的设计界则回应以提倡“民族性”或“民族化”的设计发展思路。

然而有必要紧跟着指出的是，对“民族性”的提法需要格外审慎地对待。

所谓“民族性”最直接的资源之一固然是历史传统。特别是，由于本土文化特性在西方化进程中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在那里似乎并没有太多可资利用的民族文化个性，因此民族性的搜求在多数情况下复又被等同于向历史传统垂询，向那尚未受到外来文化侵扰之前而保有了相对独立性的文化系统发出询问。这就带来了民族性探求中的悖谬处境——一方面，历史中所呈现的“民族性”实际上并不能够代表当今的民族性，因为民族文化个性一类的东西照例并非一成不变的凝滞之物，而总是伴随着历史变迁呈现旧成分之消退、新成分之相继生成的流变特性；另一方面，当下现实的“民族性”反而遭受着遮蔽或被当做异化了（非本真的）的民族性看待，尽管对近代以来本土文化个性的面貌及其形成过程还无从全面估价，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其中已经以及正在搀杂进、融会进来一些不可忽视的外来文化因素。归根到底，造成此种背谬处境的根由在于，“民族性”提法当中在逻辑上隐含着一个中外两分的隐蔽预设，从而在实质上阻挡着对民族性问题形成更为冷静、客观的理解。

进一步，以探求民族文化个性为目标的历史研究通常以



西方文化为参照体系采取比较研究的途径进行。这一类的研究为了寻找和突显差异性，常常使历史或文化更广大的一般背景，连同文化系统中的其他因素一并遭到晦蔽。这一点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守成论者那里已经展现过多种表现形态，在20世纪末本国设计领域里也有其典型的表现形态——包括建筑、服装、陶瓷、家具、装饰、包装等设计领域都曾经一度出现截取或套用历史上出现过的风格样式或形式元素的现象，其中许多案例对古代形式元素的仿造和套用是相当表面化的——当传统的大屋顶被强行安在一座现代火车站建筑物的顶部时，这种形式上的借用显明了从功能到形式到建造技术等设计基本要素之间的不协调，也显明了对传统建筑形式之基本历史真相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和设计观念的违背和抵触。对于像唐装或明式家具等古代形式的仿造来说，虽然那些仿古的设计在实际中不一定意味着商业上的不成功——在一个讲究“多元化”的国际市场上那些东西有时候的确可以作为民族性或准民族性的某种符号引来好奇的目光，而在一个文化上追求自尊和自信的国内市场上仿古的样式通常也能博得同情和赞赏——然而，就设计实质而言，如果对某种历史样式或风格要素的截取所追求的仅仅是在形式上或视觉上唤起人们关于民族性特征的某些联想，这样的设计将大有可能由于缺失内在的依据而流于表面化的仿古，由于缺失现实的基础而流于样式主义的危险。更紧要的问题还在于，对历史样式或“民族”风格做这样的借鉴是否可能真正导致富于创造性和生命力的设计。



在此，不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李济先生曾经就科技问题批判过的两种现象。他在《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案：载于《考古琐谈》），对于科学技术问题，国人更感兴趣的不是科学而是科学在工业中的运用，这种侧重在技术层面上的学习或借鉴很难导致真正的科学理性和科学的进步，也很难为技术本身带来实质性的突破。他的以上批判虽然是针对科学技术问题谈的，但以此衡量上述那种片面套用历史样式的设计也是切中要害的，因为其中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只侧重对历史样式做“技术性”层面的借用，而不问其设计实质。

在同一文中，李济先生也谈到科技史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倾向，那就是旨在说明“我们也有过”的基本言路。同样的倾向在文化史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在工艺史或设计史研究中，有一些试图以现代设计的分析框架去诠释本国古代成器经验和设计经验的倾向，从中我们也可辨识出类似的“我们也有过”的心理动机。就其理论指归看这样的研究很可能事与愿违，既难于厘清历史传统的真面貌，亦难于寻得历史传统的真价值。无庸讳言，无论是功能原则，或者是人机工程学，又或者是商业广告等等，举凡我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展现过的设计形态，曾经开展出的设计经验和原则，若是按照现代设计的框架和标准去衡量，那么它们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方法的精细与成熟，以及变化的精巧和丰富等诸多方面，同现代设计相比都显得既贫乏又粗陋不堪，在那里似乎并没有太多值得重视或借鉴的东西。这就显明了这一研究路向所面临的危险——倘要



以此来解析本国的历史经验则无异于使历史价值再一次经历虚无化——直接说，如果历史的价值单单是在同现代设计具有互比性的方方面面，那么历史研究除了能够稍微满足一下文化上的自尊心以外并无其他实际的用处。实情是，一种不恰当的历史研究方向会将古代经验置于按现代标准肢解的境地，使其中真正可能具有价值的东西反而遭受到更深的遮蔽，从而阻隔了历史经验完整地得到揭示，阻隔了其可能的借鉴价值。

尖锐的矛盾已经浮现：一方面我们有着稳固的民族心，我们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是我们无法割舍的血脉和宝库，与此同时我们却又乏力于真正有效的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以来迄今为止，种种力图维护历史传统之价值的左冲右突的努力近乎表明了这是一条“此路不通”的死胡同。

关键的问题是，怎样的历史研究才有可能帮助我们转出历史价值虚无化的死胡同，又从历史文化之中讨得真价值？

刘小枫关于现代性社会理论的批判中提到了一种富有启迪的视界转换思路：把中外之争还原向古今之变，不以中外对立设置壁垒，而以古今之变观解历史。（案：参《现代性社会理论》第26—41页，转述台湾学者金耀基的观点）他又进一步提出一种可能的新姿态：不把现代性当做一股异己力量，而以一种与之休戚与共的担待精神来面对共同的现代性问题。（案：参《现代性社会理论》，第3页：“现代的问题性成为现代思想的主题，从根本上讲，这些问题对中西文化理念和社会形态的演化都是命运与共的。”第26页：“汉语社会思想应同时进入这些层面的问题，把



它们作为属己的，而非西方的问题看待，才会进入切实的现代性论理。”）

这样一种视界转换有助于打破以往历史研究中对中外两分与对立的隐蔽预设，进而也有助于帮助我们转出历史价值虚无化的死胡同——至少就本国设计史的研究而言，经过这个转换将为我们敞开一些富有裨益的新思路。

以古今之变观解历史，而不以中外对立划地为牢，意味着古今转变过程中西方世界的经验都将向我们敞开，使之成为某种可供作为寻求本国历史传统之资鉴价值的参考体系。回顾现代设计在西方世界形成及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其中富含着手工业时代的成器经验被有效地汲取、整合到现代设计当中的历史经验：例如英国手工艺运动及其思想家们的思考，德意志制作同盟的纲领与实践，北欧和日本的本土传统各自参与当代设计的组建与发展，如此等等。还值得一提的是欧美国家“后”学氛围中出现的对来源于其他民族手工业时代的文化样式之可能价值的研究——在德国的大学里进行的若干探索方向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例如以德国艺术大学设计系Sommer教授为代表，尝试搜集和研究保留在非洲、亚洲民间用水器具的用水方式和设计思想，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当代用水器具过度耗费水资源问题的新设计；又如以德国汉学家傅玛丽为代表，尝试通过各种历史资料，对中国人的用手习惯进行精细研究，以便为当代用具设计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资料。在这些研究当中，历史文化的价值皆有其具体可落实之处。

诸如此类来自西方世界的有效经验，远非仅仅是对以往历



史文化之资鉴价值的某种确证而已。不如说其发人深思之处更在于，西方世界历次对手工业时代之历史经验进行转换利用、有效整合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使后者得以契合并联结到现代设计体系当中去的多种方式与途径。

这个视界的转换对本国古代设计史的研究也富有直接的启迪——这一点对于本书将要展开的研究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消解“中外之分”的预设，平复由此挑起(以及加剧)的那些刻意突显民族文化之个性以及历史传统之价值，实则难免于对完整历史经验的遗漏和肢解、表面化乃至虚无化的设计与研究中的冲动——如上文关于我国设计与设计史研究中对待本土历史文化传统的两种倾向的分析所表明的，即同民族性(化)联系在一起的仿古设计或是受着“我们也有过”之类的心理动机所驱使而按照现代设计的分析框架去肢解历史经验的历史研究——进而揭去由此带给历史经验的种种遮蔽，才有可能使我们真正面向事情本身，使完整的历史经验得以显露，也才有可能进一步联系当代问题来探讨其可能的资鉴价值。

进一步，对于理解和把握历史来说，“古今之变”的观解本身似乎也更加符合实情。宽泛而论，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皆可视为当下的“今”，此前时代则可视为相对的“古”，每一历史时期的成器活动及其特征的形成都可以对变化了的社会条件做出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来加以领会。对于像晚唐迄宋这样一段历史时期来说，社会现实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包括物质文化在内的社会文化的动态调适性质表现得格外突出，因而也格外



鲜明地彰显出其“古今之变”的基本特性。就此而论，古今之变的观解还意味着将那些通常被人们以各种方式结构起来，又加以固定，进而使之凝结为所谓“历史风格”或“民族特性”的东西向一个动态的、调适性的生成层面还原，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在一个更加真切的层面上把捉到一个历史时期器物设计和制造的脉动。

虽然在眼下这个“后”学时代，客观性的绝对标准早已失落了，追求纯然客观性的提法也显得不再合乎时宜，但在具有一定指向性的历史研究中强调客观的立场和态度仍然是必要的，因为正是以往种种“客观的”研究帮助人们积累起了各个领域必要的知识，同时也为各个方向的进一步思考和分析判断提供着事实基础。对于本文将要展开的关于宋代物质文化的研究而言，研究的“指向性”也由上文的运思表明了两个主要方向——一是从设计发展的生成论层面把握其发展面貌以及它所抵达的历史经验，二是基于历史经验本身相对完整的呈现来联系当代问题探讨其可能的资鉴价值。

# 目 录

**自序** 1

**引言** 15

**第一章 官府手工业** 27

第一节 物品范围与生产目的 30

第二节 物料来源 36

第三节 人力资源 39

第四节 生产组织与设计师群体 43

本章结论 50

**第二章 “样”的来源及设计管理模式** 53

第一节 官府手工业中的“样”及其来源 56

第二节 设计开发一般管理模式 68

本章结论 76

**第三章 民间手工业** 79

第一节 乡村手工业 83

第二节 城市手工业 93

第三节 镇市手工业 113



本章结论 121

#### **第四章 民间设计的三个方向 125**

第一节 乡土传统与功能主义 128

第二节 城市生活与样式主义 134

第三节 商业性与实用主义 143

本章结论 147

#### **第五章 北宋工艺法令汇释 149**

第一节 材料 151

第二节 工艺 156

第三节 制作管理 163

本章结论 165

#### **第六章 设计批评 173**

第一节 奢侈品与社会学批评 176

第二节 日用物品与功能批评 183

第三节 服饰与文化批评 192

本章结论 199